

◀（上接 2 版）

华医师就曾受教于韩芬教授,中国精神病学界的不少著名医师当年也都是韩的学生。

文汇报:有数据称,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犹太人创造知识和财富的能力一直令世人啧啧称奇,是什么成就了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

潘光:近 2000 年里,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离散于世界各地,是什么让这个民族得以维系,并且重建了自己的国家?吉普赛人的遭遇似有几分相似,而后者却如散沙一盘,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我认为,犹太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其二,是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其三,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这三个支柱是犹太人能够团结奋斗,取得成功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民族非常重视家庭与教育,这点与中国文化十分相似。与中国家庭类似,犹太家庭也常常是四世同堂、三代同居。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中有许多可以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发现的箴言,如教导人们要孝顺父母、爱护妻儿,要注重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惟有读书高”)等等。

为什么我们把犹太人一起祈祷的地方翻译为“犹太会堂”,而非“犹太教堂”?因为synagogue一词除了宗教概念,还有学校的意思。犹太人除了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还举办各类讲座和学习班。比如在星期天,犹太会堂都有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周日讲堂”,我本人就在美国犹太会堂的“周日讲堂”做过多次讲座。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犹太人善于把民族的灾难如纳粹大屠杀作为反面教材,以史为鉴,警醒后人。在每个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纪念馆或教育中心。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探讨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犹太人还特别善于向世界讲述大屠杀的悲剧故事,《辛德勒名单》等奥斯卡获奖片感动了全世界。现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和国际历史教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就会世代代进行下去,持续不断地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是“日本当局救了上海犹太人”

文汇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写满伤痛的岁月,对于中国人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任何苦难都没能阻止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究竟是谁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似乎还有争论。

潘光: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话语权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于是,国外有些声音便说,当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因此“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访问国外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时,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甚至有人问我,“既然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为什么他们还要救犹太人?”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物馆内有一幅“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其中在“上海”这个黑点上注明救了 25000 犹太人,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这面旗帜才被挪走。无疑,这种“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生活的弄堂里,无疑是中国人民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难民发了数千张签证,让他们能逃离纳粹占领区,其中许多人来到了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领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拒绝犹太难民的进入。但是,到了1939年8月,日本当局便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设置了重重障碍。到了1943年2月,日本当局又设立了虹口隔离区,强迫2万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不得自由出入。应该指出,有少数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如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中帮助犹太人,被日本当局逮捕,遭严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耐心宣讲,“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这种说法基本已消失了。

文汇报:另一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时,到底有多少犹太难民避难上海?

潘光:确切地说,这里有三个统计数字:第一个是三万多,这是指从1933年到1941年,所有在上海停留过的犹太难民,包括途经上海或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总计三万余人;第二个数字是二万五

千人,指的是除去途经上海的人,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导致上海对外海路交通断绝后仍留在上海,直至1945年9月二战结束才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第三个数字是两万,指的是1938年后进入虹口地区,特别是1943年2月后被迫进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

第三个数字与很多当年生活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的回忆相吻合,因为他们只对于自己居住的虹口的情况有所了解,对于上海犹太难民的整体情况和途经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情况则不甚知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懂中文资料,因此对于《申报》等中文报刊,以及中国政府、汪伪政府的中文统计数字和相关档案,想必是没有办法阅读的。

文汇报:《犹太人在中国》一书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称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可否请您谈谈在来华犹太人研究过程中,对于建立我们自己话语体系有何体会?

潘光:如前面提到的究竟是谁救了来沪犹太人,来华犹太难民究竟有多少人等问题,本身并不难回答,因为历史总会回归其本来面目。然而,问题核心是话语体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主动、积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话语权就可能落到了人家手中。

再举一个例子,到2000年,全世界有两万多人因为解救过犹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其中却不见中国人的身影。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二战期间,上海被称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义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犹太难民?在国际犹太组织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寻找了许多年,终于发现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曾通过发签证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把所有资料交以色列相关部门审核。最终,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由此我深深体会,中国人的义举,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宣传,还能够指望谁来研究、宣传?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故事的始末。2010年,“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其主要目的就是抢救口述史料。在史学界,我们称之为“口述史学”。现在,亲历者正一天天远去,抢救工作时不我待。我们还原历

史,然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进而总结犹太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或特色。

上海缺乏能整理、编目历史档案资料的学人

文汇报:据我所知,您是学习世界史专业出身的。当年,正是那篇题为《犹太人与中国》的博士论文,开启了您对于在华犹太人避难史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理解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关系?

潘光:世界史和中国史是很难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犹太人在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也与欧洲史、德国史、犹太史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原因,就必然要涉及纳粹在德国、欧洲反犹的种种暴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世界让“国际”和“国内”变得越发密不可分,中国史和世界史自然越走越近。

曾几何时,受到资源、经费、人员调配等等条件的限制,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存在着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某种意义上的“竞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国家对于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以及人才流动效率的不断提高,历史学科的科研教学条件大大改善,两个学科逐渐地从“对立”走向了合作。我认为,在未来的研究工作当中,将世界史、中国史和上海史三方面结合起来,并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紧密联系,是摆在历史学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文汇报: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刚刚庆祝了她的30岁生日。作为会长,您见证了世界史研究的哪些变化?

潘光:30年来,上海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其一是课题研究的繁荣。当年课题还是个稀罕物,而今学者手里几乎人人都有课题,从青年课题、国家社科一般课题、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到省部级课题、上海市课题、其他省市课题,再到国际合作课题、横向课题。学者研究积极性高涨,才会硕果累累。

其二是科研经费的充裕。30年前,搞科研没有钱,而今是不差钱。那时,一个学术活动的经费往往只有几百块钱,买些水果、泡几杯茶都有困难。现在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就有60万到80万元的经费可以支配。以至于近年来只听见学者报销难、填表难的抱怨,却没了少经费、没

课题的呼喊。

其三是学科地位的提升。原来,世界史是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如今变成了一级学科。学科地位的提高,势必优化世界史学科的资源配置,提振学者的研究热情与士气,为世界史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其四是学科梯队的形成。30年来,一批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已成为世界史教学科研的栋梁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级奖项;同时,一些大师级人物继续发挥着传帮带作用,我们这两年授予陈崇武、李巨廉、叶书宗、艾周昌、王斯德五位老专家学会的“终身学术成就奖”,为中青年树立了标杆。

其五是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日益密切。近年来,世界史学会吸收了一批中学历史教师加入学会,2015年又开始举办历史教学论坛,将中学历史教学纳入世界史学会的研究范畴,将世界史教研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使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更趋密切。

文汇报:机遇总是与挑战伴生。您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新的挑战?

潘光:说到问题和挑战,我特别要提一下上海现存历史资料和档案的整理与开发问题。我曾多次接待来沪做专题研究的外国学者,但到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一看,除经济史和中共党史等一些专题外,还有许多历史档案资料并没有系统整理和编目,使学者们不得不去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捞针”。这使我痛感,上海还有那么多档案有待发掘、整理、翻译,这是历史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前上海的档案资料尤其复杂:公共租界的档案是英文写的、法租界的档案是法文写的、日本人的档案多是用日文记录的、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的档案则都是中文繁体字,上海犹太人的档案甚至有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还有俄国人的俄文档案、波兰人的波兰语资料、德国驻沪机构留下的德文资料等等。上海档案馆中的档案资料大概有几十种语言,整理难度极高。

1995年奥地利总统克萊斯提尔到上海访问,提出赠送20台电脑做档案整理之用。他的好意令人感动,但我们并不缺电脑,而是需要既懂历史又懂多种外语的人才,不是几个人,而是成百上千的能够坐下来做这样艰苦细致工作的人,也许要做许多年才见成效。当然,这项工作不是一个学会或一个单位能完成的,需要各学会及各部门的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

